

“反城市主义”与城市人口调控的谱系

赵益民

摘要：要理解城市人口调控问题，我们需要首先承认这个问题所包含的空间性，以及这种空间性具有的时间维度。借助福柯的谱系学方法，本文探索了意识形态中所包含的一种“反城市”观念，尤其是它与变动不居的城市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之间错综复杂的时空关联，并由此发现“反城市主义”是一个复数的概念——它在我们的城市时代变得更加隐蔽、微妙，但却发挥着与以往相比更为突出的作用。在人口调控的过程中，城市空间和时间矛盾性地凝聚在这种具有自身历史和地理脉络的“反城市主义”观念之中；这一观念通过特定的空间图绘方式合理化特定的知识，并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权力机制，而人口调控就其本质而言只不过是新的社会—空间排序过程的一个基础环节。

关键词：城市化；人口调控；谱系学；反城市主义

作者赵益民，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

一

过去 40 年的巨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城市境况。我们能够从宏观的政治经济维度对这一巨变进行分析，比如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政策在宏观政策中的重要性以及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我们也可以

在日常生活里,通过崭新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对巨变进行直观把握。在当下的历史—地理节点上,我们似乎已经可以将新的城市经验与既往经验完全切割开来——毕竟,重工业立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连同那时捉襟见肘的城市生活一起。但是历史的延续并没有被空间的巨变彻底掩盖,在新的城市经验的很多维度上,我们依然能够观察到既往城市经验/政策的影子。

其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维度便是旷日持久且日趋激化的城市人口调控问题。与计划经济时代对人口流动的严格控制不同,进入城市的大量所谓“流动人口”构成了最近40年城市巨变的核心推动力,但是他们在城市里的生活却屡屡遭遇名目繁多的“调控”和阻力,并由此而引致了王春光(2006)归纳的“半城市化”现象。在这个维度上展开的最新案例来自北京。

在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学科范畴内,对“流动人口”及户籍制度等相关话题的讨论已经相当丰富。在早期对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所做的研究(李培林,1996)的基础上,目前的主流观点已经注意到歧视性制度所造就的本质化身份(陈映芳,2005),并在此基础上呼吁我们转换分析视角,通过过程化的公民权概念来实践“承认的政治”(王小章,2009)。在近期一项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调查中,杨菊华(2015:61)发现流动人口总体融入水平仍然不高,并且“制度约束和结构排斥使得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融入程度严重滞后于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融入”。这些研究充分展示了广义的制度约束(并不局限于户籍制度)是如何限定“流动人口”的城市经验的,同时也提示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这些制度约束背后又遵循着什么样的逻辑。

毋庸讳言,前述一系列调控人口的政策/制度本质上都是城市政策,它们的核心目的都是为了在城市化过程中按照某种默认的城市观念重新进行社会空间排序(socio-spatial reordering)。在城市观念和社会排斥实践之间,空间变成了具有媒介作用的关键词,并因而可望成为我们理解制度逻辑的一个切入点。但空间应该如何定义和分析呢?在人文地理学文献中,对空间的界定多样并且动态,几乎无法穷举(文军、黄锐,2012),比较一致的观点是:空间与社会是相互形塑的,作为社会过程的中介物(intermediary),空间也同时被社会过程塑造和重塑,因而内蕴着政治性(Harvey,1996)。在多琳·马西看来,空间概念和内涵的多样性(multiplicity)对应着政治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所以我们思考空间的方式直接影响着对政治问题的探究和对新的社会过程的构想(Massey,2005:9-11)。

把空间放置在分析框架的核心位置,我们便可以从可见的(visible)城市变迁出发,去探索城市政策的主体(subject)及其能动性(agency),进而借助空间视角对制度逻辑进行更深入的剖析。在人口调控问题上,空间的在场突出体现在那种默认的城市观念上:到底何为城市,何为首都?为何特定的产业可以被归类为“非首都功能”并加以疏解?为何城市的总人口要施加如此严格的上限?除了语焉不详且争议颇多的水资源限制这个理由外,我们至今依然不清楚,指引着这些政策制定的理想城市状态是什么模样。这个默认的城市观念虽然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一种空间想象,但是它与城市政策和制度之间的勾连立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在这一知识与权力联结的过程中,空间图绘(mapping space)在话语层面合理化了特定的知识,从而服务了特定的权力机制(Harvey, 1996: 111-112)。

通过分析空间想象与社会过程(尤其是人口调控过程)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和地理动态,我们能够批判性地审视城市时代的意识形态,构想和实践别样的城市空间,从而更有效地争取并重构城市权(the right to the city)(Harvey, 2008; Lefebvre, 1996)。这一分析要求我们同时推进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一方面,我们要将城市议题空间化,通过空间的维度去思考和反思社会实践及政治经济框架;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将这一空间机制历史化,通过融入时间性的视角来识别空间变迁及其内在逻辑所具有的惯性和断裂。为了同时关照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我在这篇文章里将借助福柯的谱系学方法(Foucault, 2000)去解析当下城市境况的意识形态动态——具体来说,我将讨论城市观念背后的空间图绘是如何生成和演变的,以及它的断裂和延续反过来又如何塑造了城市制度与政策,最终不断改造我们的日常生活。

二

在引言中已经提到,目前政府对待大城市的态度(以及相关的规划、方针和政策)是受着一种默认的城市观念指引的,那么这个观念——或者说是绘制空间的话语——是什么呢?为了更好地界定它,我们需要进一步扩展视野,在更广大的地理和历史语境中搜寻答案。在一篇发表于1976年的文章中,旅美地理学家马润潮总结了当时中国的“反城市主义”(anti-urbanism)政策(Ma, 1976)。通过对中国半殖民地历史和革命历程的介绍,以及“下放”和“上山下乡”政策的梳理,他

指出社会主义空间策略事实上建立在反城市(anti-urban)的基础上。一方面,工业发展过程中要求转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事实上严格控制和阻止了城市空间本身的扩张;另一方面,消灭“三大差别”(脑体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方针在实践中主要通过向农村转移城市资源(其中包括知识青年等人力资源)而得以推进。“反城市主义”这个概念由此进入我们的视野^①。

城市和现代性在社会学研究传统里常常是成对出现的概念。比如,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中,齐美尔将大城市中人们情感生活的紧张归咎于从劳动分工和现代文明中日益发展出来的一种精神(geist),这种精神遵从市场原则,受一种理性计算的经济利己主义(economic egoism)支配,将人的个性贬低得毫无价值。最终,现代文化中的客观精神压制了主体性,作为个体的人也被化约为了可被量化的“客观”的存在(Simmel, 1971/1903)。芝加哥学派的路易斯·沃斯继承和发展了齐美尔的观点,他在后者描述的城市个性的精神分裂(schizoid)特征的基础上,提炼出了支撑城市主义理论(a theory of urbanism)的三个基本属性:人口规模膨胀、高密度社区,以及个体和集体生活的异质性(Wirth, 1938)。与齐美尔不同,沃斯并没有对这种城市主义的状况进行规范性评价,而是将之视为一种新的值得进一步探索的物理结构、生态秩序、社会组织系统以及个性的集合。换言之,城市主义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个体性被劳动分工化解为诸种范畴、“均质人”(average person)等社会现实只不过是历史进程中激起的若干浪花。

如果说沃斯的生活方式论为20世纪早期对城市主义的社会学探索设定了一个规范议程,那么齐美尔的担忧与愤懑则更加接近“反城市主义”的观念和态度。迈克尔·汤普森将这一观念/态度界定为人们对现代性的一种保守反应:面对被城市空间加剧的原子化和失序生活,人们开始探索别种空间资源以拒斥现代形式的生活和意识,并由此而构建起有别于城市主义的情感意识、生活形式和社会联结方式(Thompson, 2009:10-11)。在日常生活中,“反城市主义”的观念和对道

^① 关于“反城市主义”这个概念在中国的应用,学界有过长时间的争论。陈金永(Chan, 1988; 1992)认为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只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城市精英的利益。柯克比(Kirkby, 1985)则把焦点放在工业化的问题上,认为中国当时的城市政策是由工业政策主导的,因而并不赞同从西方学者的田园牧歌想象出发构建中国的“反城市主义”概念。柯克比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林初昇(Lin, 1998)的支持,后者强调当时城市政策中对于管控性(manageability)和军备方面(military preparedness)的考虑。另外,郭彦弘(Kwok, 1987)对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4)城市过程的经验分析也初步揭示了当时对“反城市主义”的反对。但是,在第三和第四部分中,我将借助经验材料证明前述研究,尤其是郭彦弘的转折说,对于中国城市政策和态度的前景过分乐观了,而“反城市主义”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

德自我(moral self)的追寻常借用非城市(nonurban)的生活形式和传统道德信条加以表征,并通过特定的空间过程进行实践。“反城市主义”观念最常见的话语表达是对田园牧歌的怀旧式追忆,这在罗伯特·博勒加德对美国郊区状况的历史考察中有着鲜明的呈现(Beauregard, 2006)。在他看来,托马斯·杰斐逊可被称作美国的第一个“反城市主义”者(Beauregard, 2006: 73),后者在写作中对大型聚落始终抱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认为工业化和资本竞争不仅会伤害农业社会的根基,而且会最终导致自由的败坏。这一立场在19世纪晚期的美国逐渐演化为一种对城市郊区的迷思:作为城市和乡村的结合体,郊区可以被发展成为所谓田园城市(garden city),从而能够兼容城市生活与个体之中内蕴的保守价值。但是最终,与郊区兴起相伴随的是美国内城的衰落和事实上的种族隔离状态(Massey & Denton, 1993),而面向郊区的逃遁也只是讽刺性地造就了一种千篇一律的低档建成环境,在那里的人们发现自己再也无处可逃(Mumford, 1961: 486, 引自Thompson, 2009: 24)。

但田园牧歌和郊区化并非“反城市主义”唯一的话语表达和空间机制。汤普森注意到,虽然“反城市主义”这一意识的起点是对自然(natural)和人造(artificial)所做的区分,但是它的焦点和具体表现随着历史和地理境况在不断变化,并因此产生了多样且动态的政治效果。换句话说,“人类思想和行动事实上是镶嵌于(embedded)空间之中的,而这也就意味着,思想和意识的主体间属性(intersubjective nature)受制于空间与社会联结状态(association)之间的关系及其属性”(Thompson, 2009:13)。为了理解中国的城市和人口调控状况,我们不得不进一步发问,马润潮在1976年揭示的那种社会主义“反城市”策略受制于什么样的空间和社会联结状态?这一策略经过什么样的机制才终于把阴影投向了当下的城市进程?面对这一问题,前述社会学传统的不足立刻凸显:他们通常将“反城市主义”等价于对城市现代性的保守主义反动,却忽视了一支在相反的、革命的方向扛起“反城市”大旗的力量: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思维与城市》一书中,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城市观念做了精彩的述评(Lefebvre, 2016)。通过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城市实在(urban reality)的段落,列斐伏尔发现城市状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构建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后者那里,一国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导致了工、商业劳动力与农业劳动力的区分,这进一步造成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分隔

和对立（Marx & Engels, 1998:38）。立足于这个论断，列斐伏尔回顾了从古代到中世纪再到工业革命时期的城乡关系演变，然后在这一历史主义框架中推出了他自己的结论：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建立在哲学一般性上的抽象论断，而是建基于对欧洲当时被忽视的城市历史的重新发现（Lefebvre, 2016:32）。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城市生产出了历史的能动性，并成为历史的主体（the subject of history）：一方面，城市生产了诸多物品（“生产”的狭义层面）；另一方面，城市生产了工作、观念、语言、灵性（spirituality）等一切构成社会与文明的事物（“生产”的广义层面）（Lefebvre, 2016: 34 - 36）。正是在城市中，资源、生产工具、资本、需求和愉悦得到前所未有的聚集，市政管理、警察、税收等事务（municipality）成为必需，作为整体的政治成为可能，劳动分工被进一步推进，并造成了广泛的异化和阶级的生成——所有要素一起构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革命纲领和行动的前奏（Lefebvre, 2016: 37 - 38）。

但是城市在他们的革命纲领中将要扮演的角色却是完全负面的：消灭资本主义和消灭城市被视作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为什么会这样？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简短地回顾恩格斯在工业革命时代切身经历的城市问题（马克思对城市经验的论述则相对有限）。1845年，青年恩格斯根据他在英国城市（以曼彻斯特为主）的见闻写就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并尝试通过对城市状况的勾勒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性质（Engels, 2009/1845）。面对雄伟壮丽的河景街景和肮脏拥挤的贫民窟之间鲜明的对比，无比震惊的恩格斯将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造就了资本和人口的高度集聚，不仅导致了恶劣的城市环境，而且通过“竞争”的话语促成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all against all）的社会战争（social war）。列斐伏尔总结道，城市空间在恩格斯那里被视作一个压迫的空间——资本主义秩序（order）导致了城市状况的混乱（chaos），反过来又用种种空间手段对贫穷和混乱加以分隔和掩盖（Lefebvre, 2016: 10 - 11）。换言之，原子化、异化、贫困、空间区隔——这一系列城市问题归根结底都是资本主义问题，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所引致的人口集聚和城乡分割。

恩格斯在青年时代的观察不仅一直影响着他的后续写作，而且最终导向了他对城市空间的乌托邦构想。在发表于1872年的《论住宅问题》中，他将反思和批判的对象转向当时德国国内热议的“住宅短缺”现象（Engels, 1935/1872）。针对普鲁东主义者废除住宅租赁制度、把承租人变成分期付款的房主的论调，恩格

斯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他看来,所谓住宅短缺,和曼彻斯特的贫民窟一样,都是资本主义造就的社会问题: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工人才被引诱到城市里,城市空间才会过度膨胀,住房才会短缺,城乡矛盾才会被推向极致。因此,住宅短缺问题应该被视作城乡关系这一中心问题的次生结果,或者说,这一短缺只是内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必要制度(necessary institution)(Engels, 1935/1872: 46-47)。为了克服诸如贫民窟和住宅短缺这一类现象,必须首先找到办法消解城乡对立。

这个问题随后在《反杜林论》(Engels, 1962/1878)中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分析。面对杜林所谓“城乡分割是社会之固有结构”的观点,恩格斯大加挞伐:这两者之间的对抗性绝非内在于事物的性质之中,而只不过是劳动分工的一个外在表现(Engels, 1962/1878: 398)。也正因为此,杜林对城市空间的改良主义设想(根据技术和社会需求重新分布城市人口)并不能解决内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的问题。与之相对,恩格斯从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那里获得了别样的思想资源。两位乌托邦思想家都坚信,克服资本主义的革命必须建立在取消劳动分工的基础上,而取消旧有劳动分工的首要前提就是取消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立(antithesis),代之以将人群以1 600到3 000不等分组,然后点状分配在大地上(Engels, 1962/1878: 402)。这一系列乌托邦思想资源帮助恩格斯巩固了自年轻时便树立起的信念:城市终将消失,城市必须消失,继之以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平均分布(Lefebvre, 2016: 103; Engels, 1935/1872: 54)

通过借助这一革命的“反城市”脉络,我们能更好地理解马润潮在1976年总结的“反城市主义”政策。那时的社会主义空间策略本质上是上述乌托邦构想在中国大地上的一次实践,而其中介则是斯大林(1971: 19-23)对城乡、工农和脑体三大差别的论述^①。尽管目前的政治议程已经与当时大相径庭,但是这种“反城市主义”理念似乎仍然影响着我们的城市观念和政策。为什么会如此?这个问题也构成了本文的核心关切。为了更好地解答这个困惑,我想从两个角度入手:第一,“反城市主义”在中国扎根的历史和地理机制;第二,这一观念为当前城市政策所接受的契机和逻辑。以北京为例,我将在第三节中对第一个角度做详细探讨,

^① 欧美在19世纪以降发展起来的“反城市主义”有着工业大发展和城市迅速扩张的时代背景,苏联和东欧则部分地受到了同一进程的影响,同时又因为自身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而对城市与自然的融合有着一定的迷思(Kopp, 1970)。这两种反城市的态度都植根于本地的历史地理状况之中,而中国的语境与之相比有很大差别,这一点将在第三部分更深入地讨论。

而第二个角度则构成了第四节的主要内容。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反城市主义”作为一种观念和态度，可以与迥异的城市政策挂钩，我所关心的并非某项具体的城市政策如何延续至今，而是在不同的政策背后为何会耸立着相似甚至相同的观念。这一延续和断裂的辩证需要我们对历史地理过程作更为详细的讨论，而这也是我采纳谱系学的原因——“[它]必须对事件的重现保持敏感，但不是为了追踪事件演进的渐进曲线，而是为了离析事件扮演不同角色的那些场景”（Foucault, 2000: 369）^①。

三

“反城市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有民族历史（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需求两个维度的基础。一方面，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特征不仅为民族精神添上了救亡图存的底色，而且也成为历史和意识形态的书写基础。在这些救亡图存的话语里，大城市（及其囊括的诸多租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提倡的重工业优先政策从根本上决定了那时的经济发展模式，因而也成为制定城市和人口政策的出发点与归宿。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需求这两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为“反城市主义”态度和政策提供了根基。本节讨论从一个简短的救亡图存史开始，力求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经济和城市（人口）政策放置在中国城市与现代性的历史脉络里。然后我将稍加论述苏联模式对社会主义中国工业和城市政策的主导性影响，并将这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要素放入到北京城市规划的案例中去，通过经验性材料说明“反城市主义”态度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机制与社会效果，从而为接下来在第四节剖析当前城市人口调控的内逻辑奠定基础。

通行的中国近代史论说均把鸦片战争视作“近代”的开端。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将中国裹挟其中的时刻（Marx, 2007: 27 - 28），也是“理性化进程从外部将中国人的生活带入普遍历史之中”的时刻（李猛，2010: 24）。从那时起，如何救亡图存便成为整个民族的中心议题，并鲜明体现在种种对“现代”的追寻之中（汪晖，2000 & 2008）。在陈映芳（2012: 5 - 6）看来，多重且动态的“现代化”目标自

^① 这句译文参考了朱苏力的翻译，参见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7010.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2月15日）。

鸦片战争之后便成为驱动中国社会持续变动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包括但不限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科学、自由、民主等理想。在这一根本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之中,相对于传统乡村生活的城市和工业文明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后者因为其自身与现代性的内在勾连而成为承载着“现代”观念的核心地带(李欧梵,2001);另一方面,城市空间也是民族屈辱最为直接的表征——毕竟,帝国主义扩张在中国最鲜明的空间表达就是设立于各通商口岸的租界区(Murphey, 1977)。

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国城市化的错综关联很快便激发出大相径庭的文化解读和城市观念。根据苏珊·曼(Mann, 1984)的综述,有三种对待城乡关系的态度盛行于20世纪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第一种是乡土主义(nativism),以《中国家庭问题》的合著者易家钺为代表。借助顾炎武著作和当时大众文化中的反城市思想资源,他声称中国人的“民性”忌讳城市——作为农业人口,我们的历史和情感全部都寄托在乡土之上。第二种是重建主义(reconstructionism),以董汝舟及陈子诚为代表。面对大量涌入城市的农业劳动力和农村资源,他们将讨论的重心放在了快速城市化的物质条件(比如交通基础设施的长足进展)以及城市中跟不上时代步伐的制度结构等议题上,并借用梁漱溟在乡村建设中对“真民治”的呼吁,强调城市的顺利转型将足以造就新的文化渊藪和乡村枢纽。第三种则是乐观主义(positivism),这一派观点集中反映在吴景超193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之中。在他看来,中国的城市化是超越传统社会结构的关键一步,并将有望由此加入英国引领的社会进化历程之中。发达的城市和交通通信设施不仅能够提高生活水平,而且最终能够帮助国民摆脱对饥饿的恐惧和对小农经济的物质与精神依赖(吴景超,1933)。

对待城市的迥异且彷徨的态度事实上反映了追寻“现代”的中国人的一种怀疑精神(ethos)。在这里,对“现代”的追寻本身内蕴着对“现代”的质疑。借用汪晖(2000: 50)的术语,这体现的是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具体来说,“帝国主义扩张和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危机的历史展现,构成了中国寻求现代性的历史语境”——这一语境与追寻“现代”的终极目标一道,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引入马克思主义这一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的历史条件(汪晖,2000: 50-51)。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脉络里,受半殖民地经历影响的民族精神及其城市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包含的反城市态度交汇并合流,然后随着特定的政治经济过程而深刻塑造

了我们的城市体验。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的城乡关系和城市观念首先是历史性地生成的空间再现，其次才是受政策指令影响并服务于这些政策的空间机制。

具体来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农村逐渐被开拓为革命实践的前沿地带，“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也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取得主导地位（毛泽东，1966；1930），并成为建立新政权的一个重要条件。半殖民地的屈辱历史和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一起，助长了一种将革命的乡村与保守反动的城市相对立的观点（Meisner，1999；1977：76-77）。在这一历史进程的基础上，真正让“反城市主义”深入政治经济实践的是引自苏联的以重工业为核心目标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以“一五”计划及其中作为核心的苏联援建项目为标志，中国人迅速接受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样一种时空观念，并且模仿苏联，将重工业迅速发展视作走向“现代”的根本途径（胡绳，1991）^①。置身于这样的政治经济格局里，城市的属性和地位悄然发生了变化。

城市与革命如何联结是苏维埃政权建立早期一个被热烈争论的话题。苏联的革命者们深受前述恩格斯之乌托邦观念的影响，坚信社会主义城市在物质形态和社会秩序上一定会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而且城乡之间的差别一定会被消灭，但是他们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问题上陷入了分歧。根据阿纳托利·柯普（Kopp，1970）的记述，苏联当时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分裂成“城市主义”（urbanists）和“去城市主义”（de-urbanists）两个派别。“城市主义”者建议在城市中大规模兴建有充足交流和休憩空间的高层公社大楼（communal houses），这些每幢能够容纳5000名居民的建筑本身可以构成城市空间的中心节点，核心和边缘的区分在这里也便无效了。“去城市主义”者们则走得更远，他们遵循着恩格斯的教诲，计划根据资源布局、工业基地建设和交通设施的发展将住宅平均地点缀在整个国土上，从而使人口回归自然，并且一劳永逸地解决城市化与去城市化、中心与去中心、固定与移动之间的对立。当然，这两种乌托邦都没能变成现实。1930年5月，苏共中央做出最终裁决：“在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只有把资源最大限度地应用在迅速工业化上才能够为生活方式的彻底转变创造物质基础。这些

^① 这种接受和模仿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照抄，而是加入了对自身状况的考察与反省。尤其是在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以及同年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之后，我们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反省得到进一步推进。但是这样的动态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重工业优先发展政策和下面将要详细论述的“反城市主义”的政策与态度。

有害的乌托邦方案一旦实施,必将导致资金的浪费并打乱我们对生活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战略部署。”(Kopp, 1970: 186)

苏共中央的这一指令不仅表明了重工业优先方针的确立,而且也标志着城市空间在政治纲领中的地位被彻底降格。在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眼里,城市不再如恩格斯所述是取消劳动分工、克服资本主义的首要前提,而是沿着一个新的脉络展开成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空间容器——如此才足以构成最终解决城乡对立和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这一近期任务和远期目标的区分具体地表达在了城市规划的官方定位上:作为综合性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城市规划的主要任务只不过是经济计划部门的决策给落实在图纸和大地上(Kopp, 1970: 164)。就这样,城市规划自身所具有的能动性被取消,成为服务于经济尤其是工业发展的类“后勤”部门。这样的政治经济安排变换了观察和使用城市的视角,但是不变的是对城市本身的漫不经心与排斥态度。毕竟,工业发展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消灭城乡差别,树立完全崭新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

与引进重工业优先方针同步,中国也很快将苏联的这种城市观念和实践融入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之中。1954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贯彻重点建设城市的方针》的社论,其中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城市所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最重要最基本的乃是工业……因此,社会主义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必然要从属于社会主义工业的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城市的发展速度必然要由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的速度来决定,这个客观规律是决定我国城市建设方针必须是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根本原因。”(人民日报, 1954)这一体现了苏联影响的城建方针随后迅速与“一五”计划同时应用到实践之中,指导了重点工业城市的新建和扩建以及一般城市的“维护”工作(万里, 1994)。为了使资源和资本被最大限度地保留在生产过程之中,城市只被视作承载资本积累和循环以实现工业化目标的空间载体。因此,城市建成环境(包括住房和市政基础设施等)被归入非生产性领域,并陷入长期投资不足的窘境(Wu, 1997: 649-650)。这一系列措施相叠加,最终形成了高工业化速度和低城市化水平并存的局面(Kirkby, 1985)。

在北京,城市与工业的关系相对更为特殊。一方面,地缘政治的考虑影响了中央在北京发展大工业的决心;另一方面,首都的性质和地位也引起了对“大城市”特征和预期人口规模的争论。在1953年11月上报中央审批的北京城市建设规划草案中,首都建设的总方针被确定为“为生产服务,为中央服务,归根到底是

为劳动人民服务”（张敬淦等，1987：19）。但是直到1956年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之后，大工业才在北京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指导1958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草案核心关切（张敬淦等，1987：33-35）。同时，有关城市人口预测和基础设施规模的争论也在北京市委和国家计委之间爆发：前者认为北京的工业发展需要城市在20年内达到500万人口，为此需要将道路红线拓宽，为未来留有余地；后者则出于控制城建投资的考虑，认为人口应该确定在400万，道路应该缩窄（张敬淦等，1987：21-25）。两者之间的争论促成了苏联城建专家工作组对北京城建总体方案为期两年（1955—1957）的业务指导。但是政治的影响力并没有在这些专家面前消散。彭真在1956年10月10日的北京市委常委会上发言：

我们中央从来就是说要学苏联先进经验，没有说过让大家学习苏联落后经验嘛！不要受教条的约束。从实际出发就是考虑了可能与必要这两条。人口规模问题，就要看看现在和将来。要高瞻远瞩，要考虑一千年一万年以后的事，要留下将来发展的余地，不要把子孙的手足捆住。[我们说]市区远景城市人口提500万人左右。毛主席说：“不要一千万人？将来人家都要来你怎么办？”问题很简单，就这两句话，我们实行法西斯也不好。我提个意见：城市人口近期发展到500万人左右，远景要到千把万人。（北京市档案馆，1956）

在当时领导人的眼中，北京的城市规模因为工业化的进展而不可能很小，但是城市过大了也不好，必须加以控制（张敬淦等，1987：35）。彭真的发言和苏联专家的草案相结合，生成了1958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草案的基本内容：第一，把规划范围从600平方公里的市区扩展到8860平方公里的地区（包括了郊区和农村），市区人口控制在500~600万人；第二，为了避免市区人口过度集中，采取“子母城”的格局发展一批卫星城镇，地区总人口在远期（50年）达到1000万人口或者更多一些（张敬淦等，1987：35）。“1000万”这个人口目标似乎就是在这样不经意间出现在时空视野之中的，而它的使命要到改革开放之后才会充分显现。

上述草案完稿于1958年6月。当年9月，在北戴河会议召开之后不久，北京市委便立即着手修改草案。方案修改的核心是消灭三大差别，因此在城市布局上提出了既要有合理的集中，又要有合理的分散，采取“分散集团式”的布局形式。

为此,规划的地区范围被进一步扩展到 16 800 平方公里,总人口仍控制在 1 000 万人左右,而市区的地理范围不加改变,人口目标则从 500 万调减至 350 万(这个数字接近当时的实际人口数量)。为了进一步取消工农与城乡之间的区分,新的方案还规定大工业以后全部放置在远郊区,市区则要星罗棋布地发展小面积丰产田,从而使城市和农村相结合(张敬淦等,1987:39-41)。

这是北京第一份被正式颁布实施的现代城市总体规划,而“反城市主义”的中国实践在其中得到最为鲜明的表达。在民族历史(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需求两条脉络的主导下,规划师把城市空间狭义地理解成容器和载体,而非日常生活的交错与相遇,这构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空间图景。虽然城市以及城市职工在这样的空间和制度安排下得到了远比农村居民更多的事实上的优待,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否认“反城市主义”实践的充足理由。归根结底,城乡二元体制的建立以及给城市职工提供的福利待遇所能附着的并非城市空间本身,毋宁说其基础是支撑着工业化的“单位制”(Hsing, 2006; Lu, 2006; Wu, 1995; 李猛、周飞舟、李康, 1996)——“条条为主,条块结合”的口号便突出呈现了这一特点,而其中的“块块”(基于领土安排的市政府及其下设机构)能够扮演的角色十分有限。

城市空间在这个政策框架中始终是隐形的,同样隐形的还有人——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政策制定的核心关切是一以贯之的,也即对象是否有助于实现工业化。城市空间没有被全盘否定,是因为它们能够承载工厂;城市职工被给予相对的优待,是因为他们能够操作机器。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城市总人口随着工业的发展而迅速膨胀,逐渐威胁到集中资源发展工业的既定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户口制度的重要性最终得到确立(以 1958 年颁布实施的《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它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以及人民公社制度一起,构成了优先发展工业战略的三项基础性措施(蔡昉, 2007)。制度的约束不仅体现在对潜在人口流动的限制上,而且还通过对既有城市人口的驱逐和疏散展示威力。在北京,1949 年—1960 年间,人口增长达 318 万人,其中 153.7 万为机械增长(净迁入人口);这个数字是 462.3 万迁入人口与 308.6 万迁出人口之间的差额(薛凤旋, 1996: 161)。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上海(陈熙, 2011),而无论在北京还是上海,“凡是不利于工业化建设的人口大多被列入疏散对象”(前引, 103),从而保证城市及其人口都可以促进既定目标的实现。

空间图绘的政治经济机制和社会后果在这里得到清晰呈现。顺着民族历史

和斯大林模式两条脉络，“反城市主义”成为主宰性的城市空间再现方式，一方面通过规划图纸在宏观上加以规定，另一方面通过单位制（和对单位之外的人口的清理）来施加微观治理。在第二节讨论“反城市主义”的概念问题时，我们已经了解了思想和意识的主体间属性受制于空间与社会联结状态之间的关系。只有到此刻，我们才能够认清它们这些错综复杂的关联是怎样物质地生成出来的，又如何得以反过来重塑作为整体的空间图景和社会结构。在大卫·哈维的理论框架里，这一系列事件/时刻都是他界定的“关系性空间”的绝佳案例（哈维，2014：184-185）：在彼此关联的事物的世界里，各种基本实体都只能由它们之间的关系加以界定，而这些关系的性质反过来又呈现了空间本身的特性。换句话说，“物质与过程并不存在于时一空之中，相反，空间与时间内在于物质和过程之中”。使用这一新的界定空间的方式并不是为了形而上的纠缠，而是为了“替社会与权力关系的非物质时空性找到适当的再现”（哈维，2014：186）。在物质与非物质的这种辩证之中，诸如“反城市主义”一类的思想和记忆的地位终于能够得到恰当的把握：虽然其本身是非物质、流动且不稳定的，但它们能够激发和引导行动，从而产生稳固和物质性的后果。

秉持乌托邦信念的恩格斯或宣扬“民性论”的易家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观念会在另外的时空—社会过程里让数以千万计的人流离失所。但是更加让我们关切的大概不是过去，而是此时此刻：“反城市主义”的观念和态度是否内在于我们目前切身经历着的城市化过程之中？这两个看上去相互矛盾的过程是否存在某些被我们忽视了的联结状态？这是下一节着力解答的问题。

四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2013）

对于改革开放历程中狂飙突进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增长到

2012年的52.6%，并且预期在2020年达到60%），我们已经耳熟能详。无论是在政府文件还是学术论文里，只要论及当前的城市问题，这个比率就一定会被放置在显眼的位置，以论证我们的“成就”或者说“进展”。从表面上看，我们的城市政策和观念似乎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以往“反城市主义”的道路。在“新时代”的社会状况里，城市空间终于成了一个“香饽饽”——它既是亿万农民可以寄居和谋生的港湾（尽管不那么顺心），又是各级政府时刻牵挂的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毫无疑问，“后40年”（1978年至今）的城市观念与“前30年”相比有了很大变化。但这种变化本身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受到诸多社会状况和政治经济关切的影响，因而有着自己的时空性（spatio-temporality）。换句话说，这个新的城市迷思内蕴着某种特定的历史—地理机制，只有对这个机制做进一步的剖析，我们才可能找到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目前如火如荼的“城镇化”进程以及它和“反城市主义”立场的隐微关联。由此，我们才得以更为深入地理解城市观念背后的空间图绘是如何演变的，以及这种演变、断裂和延续反过来又如何塑造了城市制度与政策，最终在变幻的社会过程中继续规训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这一节，我将借助北京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城市政策与实践论证下述假设：“反城市主义”态度并没有消失，相反，它在城市空间日益可见的时代也同样变得越发有影响力；在新的城市状况下，这种“反城市”的态度及其影响力并非诉诸对城市空间的否定和排斥，而是通过一种特定的空间想象完成——一个作为理想型的“国际化大都市”被确定为值得追求的空间模板，一切社会安排都需要通过特定的政治经济机制来与这样的模板进行匹配，所有不相匹配的特征一律抹除，而终极目的则是一以贯之的实现“现代化”。延续和断裂的边界在这里变得模糊：我们常可以看到20世纪50年代的观点和数据被拿来支撑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为晚近的完全不同的城市政策，哪怕这两者之间的历史和地理脉络早已千差万别。诚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2001/1852）。为了进一步探究“反城市主义”这个传统如何纠缠我们的头脑，我接下来将详细介绍此观念为当前城市政策所接受的契机和逻辑。具体来说，我将论述乌托邦的理想如何逐步转型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想象，这种想象中包含了什么，排斥了什么，这些包含与排斥的内容透露着与“前三十年”城市观念的何种谱系学关联，它们又如何与城市政策和制度相勾连，服务了怎样的政治经济安排和知识—权力机制，最终又造就了什么样的新社会—空间排序。

1980年4月,北京市委印发《关于北京城市建设方针问题的汇报提纲》,随后向中央书记处做了汇报。后者将北京定性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进行国际交往的中心”,并就此做了四项具体指示:第一,北京要建设成为“全国、全世界社会秩序、社会治安、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最好的城市”;第二,北京要变成“全国环境最清洁、最卫生、最优美的第一流城市,也是世界上比较好的城市”;第三,要把北京建成“全国科学、文化、技术最发达、教育程度最高的第一流城市,并且在世界上也是文化最发达的城市之一”;第四,在经济方面要不断繁荣,但是,“经济建设要适合首都的特点,重工业基本不再发展”(张敬淦等,1987:75)。与上一节的资料相对比,可以看出北京城市建设的指导方针发生了重大变化:重工业从纲领中被剔除,代之以对社会治安、优美环境、文化发达等目标的追求。斯大林模式的痕迹被彻底抹去,城市本身具有的社会—空间特征开始得到重视,而这又和国际交往职能挂上了钩。北京市随即根据这项指示编制了新一版《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并于1983年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复。在批复中,除了重申四项指示外,中央还要求北京“采取强有力的行政、经济和立法的措施,严格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并称“这是保证《方案》实施和搞好首都建设的关键”。为此,“要坚决把北京市到2000年的人口规模控制在1000万人左右”(张敬淦等,1987:315-316)。

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这些文件里,我们可以同时发现断裂和延续的痕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是第一次有中央文件把目标从重工业挪开,移向城市空间本身。导致这个转向的触发点是污染问题。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万里在1983年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评论道:“首都的建设,经验教训很多……其中一个教训就是当时城市污染问题没有引起注意。所以现在污染问题压在那里,还没有根本解决。”(万里,1994:180)但除了应对污染的考虑之外,这个转向还传递了一些更深层的信息。在“前30年”里,执政党将自己的使命规定为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现代化,并为走向共产主义做准备。但是现在,工业化和共产主义的远景一起消失了,代之以对环境优美和国际交往的关切——而这个时候的国际交往早已没有了“一边倒”时期的意识形态色彩。究其根本,这些通过城市空间(规划文本)体现的变化其实折射了整个国家对于未来的前景展望(vision)所发生的彻底转型。虽然政治基础没有被重塑,但是对“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解读变了: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汪晖,2000:52)。在这个变动的时

刻,矛盾的“反现代的现代性”不见了,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工程也不见了;“现代”和“国际化”合流,为接下来打造“国际化大都市”奠定了思想基础。

与此同时,延续的痕迹同样清晰。“1 000 万”的人口调控目标从 1958 年延续到了这里,并且被规定为一条要保持到 2000 年的人口红线。我们可以推测,中央提此要求主要有两个根据。第一,1958 年总体规划中将 1 000 万人口设定为 50 年期限的远景人口目标,而这恰好在 2000 年之后不久;第二,批复中明确提到,对人口严加控制是“保证《方案》实施和搞好首都建设的关键”——这句话提醒我们,城市空间和人口同过去一样是作为“对象”而非“主体”存在的,二者只不过是“搞好首都建设”所需要的工具,是要按照新的计划和方案加以处理和调整的事物。唯一的不同在于,过去的“对象”需要为工业化服务,而现在则必须能对社会治安、优美环境、发达文化和国际交往有所助益。然而,北京的实际情况对此提出了严峻“挑战”。在这条批复公布的当年(1983),北京市总人口已经达到 950 万;仅仅三年之后,北京市的总人口便突破了千万大关,达到了 1 028 万^①。如何理解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呢?在某种意义上,这只是计划思维及其后果在城市领域的延续而已。

另外还需注意到,对北京人口的严格控制和全国层面严控大城市规模思路有内在的联系。对于控制大城市的政策,万里在 1986 年全国城市建设工作会议上做了详细的解释。他说:“大城市要发展,主要是指要发展大城市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要提高它的多种功能,要进一步发挥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要防止大城市人口的过度膨胀。如果大城市急剧地膨胀起来,都挤在一个小范围的空间内,我们目前又没有那么多的钱去搞城市基础设施,这样一来,水也不够喝了,房子也不够住了,车子也开不动了,空气、水也都被污染了,这个城市的多种功能还怎么发挥呢?”(万里,1994:281)这个观点乍看起来十分合理,但却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内在矛盾:大城市的多种功能和经济社会效益是否能够在不增加人口的情况下自动实现?或者说,大城市的功能和效益是为谁服务的呢?

矛盾的根源在于,这种控制观里的空间是空的——城市依然只被视作载体和容器,这个载体和其中生活着的人可以被截然分开,从而发展其中一个,规避另外

^① 数据来自北京市统计局,参见 http://www.bjstats.gov.cn/tjsj/cysj/201511/t20151109_311727.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2月20日)。

一个。如果这个逻辑继续延伸的话，我们很快便能遇见更加突兀的政策，比如将产业与人口分为高端和低端，然后只保留其中符合“现代化”目标的部分。这个贯穿的逻辑因此具有鲜明的“反城市主义”色彩。一方面，城市空间（以及城市人口）的变动过程本身被视为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这样的容器和工具实现特定的目的——在过去，这是迅速实现工业化，而现在，则是变得环境优美和“现代”。另一方面，城市规划依然不具有自己的能动性，而是在变换了目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里继续扮演被漫不经心对待的角色。的确，城市登上了历史舞台，而不再被视为一个终将被消灭的存在，但这并不是因为城市本身地位的改变，而只是因为乌托邦工程的破产。

万里对控制大城市所做的解释代表了当时决策层的主流意见，这最终在 1989 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1990 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全国人大常委会，1990）中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并立刻指导了北京市在 1990 年代初进行的新一轮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新的 1993 年版规划有两个关键点需要提起注意：首先，对人口规模的调控并没有因 1983 年版规划的迅速失败而被放弃。与之相反，新规划中明确，“人口的迁移增长要通过指令性计划和经济手段严格进行管理，逐步实行总量控制”，最终目标则是使北京市总人口在 2000 年控制在 1 160 万左右（其中流动人口 200 万左右），到 2010 年控制在 1 250 万左右（其中流动人口 250 万左右）。其次，一个更重要的改变是对北京城市性质和发展目标的重新界定：“在 21 世纪中叶把北京建设成为具有第一流水平的现代化国际城市”（北京市人民政府，1993）。对“国际”的追寻在这里被正式确立为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随即主宰了对北京城市空间的新一轮改造，并通过种种更新的话语形式延续至今。

顺着“现代”关切的引领，这个“国际”的概念包括两层内涵。一方面，城市空间要向国际先进水平对标，社会治安、优美环境、发达文化等 80 年代提出的任务要在国际横向比较中加以检验，从而确证“第一流水平”的实践和实现。另一方面，国际视野还意味着对其他国家不先进的城市教训的警惕和排斥，这尤其鲜明地体现在那时在学界和决策层聚讼不已的拉美国家“过度城市化”和“大城市病”现象（程洪、陈朝娟，2006；高珮义，1991；韩琦，1999；陶然，1995）。但与此同时，北京的人口增长并没有受规划的限制。在规划出台仅一年之后（1994），北京人口已经达到 1 125 万，接近 2000 年的调控目标；两年之后（1995），人口突破

1 250 万,超过了 2010 年的调控目标。这样的现实令人震惊——难道“过度城市化”真的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控的趋势了吗?为了要在一方面成为“国际一流”而在另一方面拒斥“过度城市化”,人口调控和城市建设的关联变得更加紧密,迅速造就了一个日趋严厉的政策链条;这进一步构成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北京大规模清理人口的基本语境^①。

对“国际一流”的向往和对人口调控的关切不仅转化为运动式的人口整顿,而且还立即和新的城市政治经济转型勾连在一起。1993 年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在短短一年后就指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颁布施行(全国人大常委会,1994),并在法律层面构成延续到现在的“土地财政”的基础。这一新的政治经济安排将城市空间的生产 and 再生产(或称“都市大开发”)摆在了政府行为的核心环节(陈映芳,2009; Hsing, 2010),并在实践中造就了新的城市前沿——“城乡接合部”。之所以可以将这一区域称为前沿,主要有两个依据:第一,这里是“流动人口”主要的落脚之所^②,因此持续被官方话语描述成“脏乱差”地带;借助这个话语,城市政策便可以更为轻松地对外来人口及其落地施加种种以“现代”和“提升”命名的治理整顿,从而构建起一种新的社会排序方式(a form of social ordering)(张鹏,2014/2001: 147)。第二,“城乡接合部”也是政府土地出让的主要地区,并且这一趋势在近年来明显加强^③。在人口调控和城市开发之间,土地出让成为一个关键的桥梁:只有在人口得到清理(包括本地人和外地人)、土地完成平整之后,上市交易才成为可能,也只有在房地产开发实现之后,新的接合部空间才能彻底摆脱“脏乱差”的局面,也才能去贴近对“国际”和“现代”的空间想象。

在新的城市政治经济机制引导下,城乡接合部的社会排序话语演化成为社会—空间排序(socio-spatial reordering)实践,除了对外来人口(及其聚居区)的污

① 关于这一场大规模清理行动的空间机制和社会效果,以及其中各级政府之间交错乃至冲突的利益格局,可以参阅张鹏(2014)《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中以“浙江村”为例的详细呈现。关于“浙江村”故事的细节,也可以参阅《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项飏,2000)。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赘述。

② 根据 2015 年的统计数据(顾梦琳,2015),北京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常住人口(580.2 万人)居住在五环和六环之间,这其中多数是常住外来人口(高达 358.6 万人),而常住在六环以外的外来人口则迅速下降,只有 63.9 万人。

③ 比如,在 2015 年,北京市出让土地 100 宗,出让金达到了当时创纪录的 1 920 亿元。这所有土地中的 84%位于五环之外,主要集中在昌平区和大兴区。数据来源:<http://land.fang.com/zt/201512/pdcj.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 年 1 月 21 日)

名化和清理驱逐之外,这个过程还包含了其他许多同样重要的环节,比如对城乡接合部村集体的重新赋权(通过股份制改造转变为本地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和社会福利保障提供者)以及对村民的“主体化”改造(通过意识形态灌输和经济利益分享将城市开发的逻辑传导和内化)。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时代的“反城市主义”态度借助周而复始的人口整顿运动具象地传达了出来,并构成了“城市经营”和“土地财政”得以崛起的一个空间条件——这便是“反城市”观念为当前城市政策接受的契机和逻辑。虽然40年来的城市政策和观念一直在变,但是这其中体现的延续性更值得我们重视。在这个延续性背后,我们能够看到空间图绘的政治经济机制和社会后果,也能够意识到空间想象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关联如何变换方式继续主宰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的认识进一步契合了地理学中对于空间问题的反思:空间具有多个维度——除了物质性的表达方式外,其内蕴的非物质性的表征(representation)也同样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感知和生活的方式;通过细节性地勾勒与定义我们的时空想象和愿景,这种种观念最终又反过来经由多样的宏观和微观机制重塑我们的生活空间乃至日常生活本身(Harvey, 1996; Lefebvre, 1991)。

五

要理解城市人口的调控问题,我们需要首先承认这个问题所包含的空间性,以及这个空间性具有的时间维度。在这里,空间和时间都凝聚在一种“反城市主义”的观念之中,它通过特定的空间图绘方式来合理化特定的知识,并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权力机制,对人口整顿不过是这个社会和空间排序过程的一个必要环节和时刻(moment)。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需要理解这种“反城市”观念所具有的多样和动态特征。这种本身并不具有物质性的观念是通过和社会关系及政治经济过程的联结来生成物质且具象的社会空间效果的。这些联结绝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意识形态的转型和国家意志/工程的推进来展开其历史—地理谱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的谱系学为这篇论文提供了一个方法论支撑:在“反城市”态度的历史地理展开过程中,关键的问题并不是确认这个态度的本源是什么,在哪里,而是要从“反城市”态度在不同历史地理场景中扮演的迥异角色中探索别样的信息,从而更好地理解此时此刻城市问题的时空性。“反城市主义”本质上是一个复数的概念,它在我们的城市时代变得更加隐蔽、微妙,但却发挥着与以往相

比更为突出的作用。这就是我在本文中想要表达的基本观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反城市主义”态度主要是通过具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城市规划图纸和日常生活中安排生产与福利的单位制加以实践的。在第三部分里我们已经看到，在民族历史（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需求（斯大林模式）两条脉络的主导下，那时的规划师把城市空间狭义地理解成容器和载体，这构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空间图景，并进一步通过分散组团式城市布局实现了与乌托邦理念的融合。改革开放以来的这40年时间里，我们的城市状况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四部分的讨论展示了对工业化的追求如何让位给了对走向“现代”和“国际”的热衷，而这又怎样为“反城市主义”与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机制的联结提供了新的接口。城市空间在这样的新时代里终于走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但却依然无法摆脱其作为工具和容器的命运。在追寻现代和“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安排里，一个作为理想型的“国际化大都市”被确定为值得追求的空间模板，一切社会安排都需要通过特定的政治经济机制来与这样的模板进行匹配，所有不相匹配的特征一律抹除。

在这样的城市时刻，我们需要回过头来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是城市？城市空间到底应该被怎样定义和生活？城市里的人应该如何才可以被视作目的而非手段？毕竟，在一个正义的空间图景之中，我们不应该一边推进资源和权力在城市的高度集中，一边采用强力疏散被资源吸引的人口集聚——在恩格斯的曼彻斯特观察中，正是这样的社会和空间安排最终激发了他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热情（以及乌托邦方案）。但是我们该如何寻找替代方案——替代方案可能吗？这一系列问题都呼唤着我们进一步的深入讨论。其中有两个方向具有非比寻常的紧迫性。第一，从“反城市主义”的断裂和延续出发，我们需要进一步反思追寻“现代”的边界应该放在哪里。当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都开始宣称自己要建设“全球城市”“世界城市”的时候，我们是时候来重新思考自己为什么要触发这样一个问题了：“现代”到底在哪里？第二，更加具有政治迫切性的方向是反思和否思常见的对“超大规模城市”和“大城市病”的忧惧，主要是因为这些忧惧混淆了因果关系，同时也因为这些忧惧的矛头全部都指向了无辜的人群。我们需要仔细探索并且广泛宣传超大城市的各种问题是如何因为不均衡发展（uneven development）而生的（Harvey, 2005; Smith, 2010）。人口大量涌入只是这个社会 and 空间过程的结果而非原因，对人口的调控自然也不可能在根源未消的时候产生任何有建设

性的反馈——也许唯一的结果只是会加重我们这个世界的苦难吧（Bourdieu, 1999）。

参考文献

- [1] 北京市档案馆,1956,《卷宗 151-1-17: 彭真同志在北京市委常委会上关于城市规划问题的发言》,北京:北京市档案馆。
- [2] 北京市人民政府,1993,《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年至2010年)》,北京:北京市人民政府。
- [3] 蔡昉,2007,《中国流动人口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4] 陈熙,2011,《人口紧缩与粮食供应》,《当代中国史研究》第18卷3期。
- [5] 陈映芳,2005,《“农民工”: 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第3期。
- [6] 陈映芳,2009,《都市大开发: 空间生产的政治社会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7] 陈映芳,2012,《城市中国的逻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8] 程洪、陈朝娟,2006,《论20世纪拉美城市化进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拉丁美洲研究》第2期。
- [9] 高珮义,1991,《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 [10] 顾梦琳,2015,《北京65%外来人口住在四环到六环间》,《京华时报》5月22日。
- [11] 哈维,2014,《寰宇主义与自由地理》,王志弘、徐苔玲译,台北:群学。
- [12] 韩琦,1999,《拉丁美洲的城市发展和城市化问题》,《拉丁美洲研究》第2期。
- [13] 胡绳,1991,《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 [14] 李猛,2010,《理性化及其传统:对韦伯的中国观察》,《社会学研究》第5期。
- [15] 李猛、周飞舟、李康,1996,《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第16卷5期。
- [16] 李欧梵,2001,《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17] 李培林,1996,《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第4期。
- [18] 马克思,2001/1852,《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 毛泽东,1966/1930,《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载于《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 [20] 潘鸣啸,2010,《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21] 全国人大常委会,199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 [22] 全国人大常委会,199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 [23] 人民日报,1954,《贯彻重点建设城市的方针》,《人民日报》8月11日。
- [24] 斯大林,1971,《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
- [25] 陶然,1995,《论大城市的发展潜力和人口政策选择》,《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 [26] 万里,1994,《万里论城市建设》,周干峙、储传亨编,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 [27] 汪晖,2000,《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死火重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28] 汪晖,2008,《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9] 王春光,2006,《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第5期。
- [30] 王小章,2009,《从“生存”到“承认”:公民权视野下的农民工问题》,《社会学研究》第1期。
- [31] 文军、黄锐,2012,《“空间”的思想谱系与理想图景:一种开放性实践空间的建构》,《社会学研究》第2期。
- [32] 吴景超,1933,《近代都市化的背景》,《清华学报》第8卷2期。
- [33] 习近平,2013,《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34] 项飏,2000,《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35] 薛凤旋,1996,《北京:由传统国都到社会主义首都》,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
- [36] 杨菊华,2015,《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37] 张敬淦等,1987,《建国以来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城市规划)》,北京: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
- [38] 张鹞,2014/2001,《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39] Beauregard, Robert A. 2006, *When America became suburban*.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40] Beauregard, Robert A. 2009, “Antiurba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England, and China.” In *Fleeing the City: Studies in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antiurbanism* edited by Michael Thomps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41] Bourdieu, Pierre, ed. 1999,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42] Chan, Kam Wing 1988,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1950—1982: estimates and analysis.” *Urban Geography* 9 (1).

- [43] Chan, Kam Wing 1992, "Economic growth strategy and urbanization policies in China, 1949—198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6 (2).
- [44] Engels, Friedrich 1935/1872, *The housing question*. Edited by Clemens Palme Dutt.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45] Engels, Friedrich 1962/1878, *Anti-Duhring: Herr Eugen Duhring's revolution in science*. Translated by Emile Burns. Edited by Clemens Palme Dutt.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 House.
- [46] Engels, Friedrich 2009/1845,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47] Foucault, Michel 2000,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In *The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 II (Aesthetics, method, and epistemology)*, edited by James Faub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 [48] Harvey, David 1996,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Oxford: Blackwell.
- [49] Harvey, David 2005, *Spaces of neoliberaliz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 [50] Harvey, David 2008, "The right to the city." *New Left Review* (53).
- [51] Hsing, You-Tien 2006, "Land and territorial politics in urba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87.
- [52] Hsing, You-Tien 2010, *The Great Urban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of Land and Property i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53] Kirkby, Richard Jr. 1985, *Urbanization in China: Town and country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1949—2000 A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54] Kopp, Anatole 1970, *Town and Revolution: Soviet Architecture and City Planning, 1917—1935*.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 [55] Kwok, Yin-Wang 1987, "Recent urban policy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a reversal of anti-urbanism." *Town Planning Review* 58 (4).
- [56] Lefebvre, Henri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 [57] Lefebvre, Henri 1996, *Writings on cities*. Oxford: Blackwell.
- [58] Lefebvre, Henri 2016, *Marxist thought and the city*. Translated by Robert Bononno.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59] Lin, George CS. 1998,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with controlled urbanization: anti-urbanism or urban-biased?" *Issues and Studies*.

- [60] Lu, Duanfang 2006, *Remaking Chinese urban form: modernity, scarcity and space, 1949—2005*.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61] Ma, Laurence JC. 1976, “Anti-urbanism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
- [62] Mann, Susan 1984, “Urbanization and historical change in China.” *Modern China* 10 (1).
- [63] Marx, Karl 2007. *Dispatches for the New York Tribune: Selected journalism of Karl Marx*. London: Penguin.
- [64] Marx, Karl & Friedrich Engels 1998/1936,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 [65] Massey, Doreen 2005, *For space*. London: Sage.
- [66] Massey, Douglas S. & Nancy A Denton 1993. *American apartheid: Segreg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dercla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67] Meisner, Maurice 1999/1977,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68] Mumford, Lewis 1961,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 [69] Murphey, Rhoads 1977, *The outsiders: The Western experience in India and China*.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70] Simmel, Georg 1971/1903,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 *Geor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edited by Donald N. Levin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71] Smith, Neil 2010/1984, *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 [72] Thompson, Michael 2009, “What is antiurbanis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Fleeing the city: Studies in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antiurbanism*, edited by Michael Thomps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73] Wirth, Louis 1938,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4 (1).
- [74] Wu, Fulong 1995, “Urban processes in the face of China's transition to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Government and Policy* 13 (2).
- [75] Wu, Fulong 1997, “Urban restructuring in China's emerging market economy: Toward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1 (4).